

序 言

研讨会企划者

村田雄二郎（东洋文库·东京大学）

作为超域亚洲研究的一环，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设置了“现代中国研究班”，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文化等多个角度展开综合性研究活动，以考察逐渐成为全球大国的现代中国之动态。主办本次研讨会，一方面是希望大家有机会了解东洋文库“现代中国研究班”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期待研讨会能够成为提高现代中国研究高度，使其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阶梯。

近年来，在现代（当代）中国研究的领域中，虽然程度不同，各国、各地区的档案资料公开·整理工作日新月异，急速发展。基于这一现状，为了考察现代（当代）中国研究的现状以及今后的方向性，我们特别邀请活跃在国内外第一线的专家学者进行主题报告、专题演讲，并设置了“战后东亚的国际关系与档案”、“民众·集体·国家”、“从档案资料看‘中国’的内与外”三个部分进行报告、讨论。在具体介绍各种资料的保存·整理·公开状况的同时，相信各报告会通过示范利用档案资料的最尖端研究给予大家启发与帮助。

本研讨会主题中的“档案资料的内与外”含有多层对比的意义。档案与档案以外的文献群、中文文献与外文资料、中国研究与中国“外部”“周边”的研究、文字资料与非文字资料、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等等，都在“内与外”的多层次对比之中。另外，如何看待与处理档案资料、行政文献等“硬件”历史资料与记忆、形象等“软件”遗产的关系也在本研讨会的思考射程之中。

最后，希望通过详细考察各国·各地区所积累的档案资料，尝试对当代中国研究进行横向地域比较，以此发现同一时代中的问题群。这也是举办本研讨会的宗旨之一。

基调报告〈档案·记录·记忆〉

民间史料与中国当代史研究之人文取向——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收藏所见

张济顺（华东师范大学）

民间史料在方兴未艾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日益显现出其价值与潜能。已有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及学者个人致力于民间史料的收集、开发和整理，华东师大—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当代文献史料中心（以下称“中心”）便是有代表性的一家。

“中心”于2014年10月成立，它并非“白手起家”，而是有华东师大中国当代史中心和冷战国际史中心多年积累的坚实基础，所藏民间史料与冷战时期的多国档案，数量和规模已相当可观。

“中心”所藏民间史料约5400多卷，超过150万页；目前已完成编目和录入数据库的民间史料近10万份。

从2009年至今，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中心编辑、东方出版中心已出版《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11种，17册，另有2种即将面市。

除去已出版的专题史料外，在量大面广的中心收藏中，一大批特色鲜明、较为系统的专题档案已整理就绪，可逐步开放利用。专题史料约分为五大类：基层单位和乡村档案、毛泽东时代各种政治运动档案、公安系统资料、内部资料以及个人专卷。

民间史料的开发、整理和运用，增进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人文取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对档案的界定，民间史料亦可称为民间档案，应属“档案之内”的资料。但与通常意义上的官方档案大不相同的是，民间史料中最大量的是社会底层全景式的实录，原始、真切而又鲜活。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达方式，都为官方档案所不能及。

民间史料“内外兼具”的特质在基层单位档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这些掌握着“小人物”命运的档案中，可解读出上层官方记载之外的底层社会的政治生态。

私家收藏的工作笔记、日记、书信等资料在中心的民间史料中颇引人注目。悉心保存这些珍贵的“独家历史”的档主，既有知名的中共高级干部，也有大量基层“芝麻官”，更多的则是名不见经传的平头百姓。

丰富的私家历史材料提供了解读当代中国历史的另一种路径：“由大及小”地接近微观社会与个人的历史“真实”，包括“个性化”及“在地感”或“在场感”。只有当宏大的历史性巨变化约为每一个个体的人生故事，通过各种复杂多变的人生面相在“小社会”中得以展开之时，这部大历史便不只是国家的整体史，极权主义、革命、现代化等等中国当代史的解释框架，才不致于日益乏力，而显现出其鲜活的价值与意义。

日記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以《蔣介石日記》為例的討論

呂芳上（台灣中央研究院・國史館前館長）

在中國近代史學界，最近出版私人日記，利用日記作為歷史研究的素材，可說蔚然成風。最顯著的事例之一是蔣介石日記（1917–1972）的開放與運用，的確帶動了民國史研究的新風氣。

以蔣介石日記作為素材的近代史研究，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日記的確有助於歷史細節的了解與認識。利用《陳誠日記》、《陳克文日記》，可以看出二戰時期孔氏家族作風不無可議之處，察考蔣日記也有類似批評；提到國軍軍紀不佳，原因之一是軍人營商的壞風氣，這是蔣介石一再告誡軍人不得經商的理由。討論 1948、1949 年國民政府的危局，利用《胡宗南日記》與蔣介石的日記對比，看出兩人對守重慶，及成都、西昌留守問題主張的落差。蔣介石威嚴而有個性，能直接進諫的周邊人物不多，楊永泰、張治中、熊式輝是其中三人，以熊式輝日記為主要依據的《海桑集》，點出蔣有「一柄兩操」、「用人牽制」、「越級指揮」之病，這可能是蔣 1949 年前後內外交迫變局下失敗因素之一，蔣的日記依稀可稽。二、近身、長時間觀察的日記，較有助於事物的了解，蔣介石日記長達五十五年，閱讀其日記，堅毅、不妥協個性躍然紙上。對照沈鴻、雷震日記，從吳國楨案、王世杰案、孫立人案到雷震案，蔣「自運樞機」，討厭「恃外凌上」，不受美國干涉，也不屑被視為自由派如胡適等人的指手畫腳，很見蔣倔強個性。拿日記及檔案合併考察，許多人指出蔣的政治風格是重文物、喜手令、注意黨性黨德、以敵為師、以宗教信仰為救贖之道，讀其日記很可體會。《胡宗南日記》中說蔣「軍事認真，政治敷衍」（1942 年 3 月），是有感而發；《陳誠日記》說「垃圾倒在委座看不到的地方」（1944 年 2 月 18 日），對官府推、拖、拉惡習，尤見諷刺。國人的陋習，蔣知道，也愛管，但無奈。三、好的日記，最好是記述時間長，內容鉅細靡遺，百無禁忌、暢所欲言，尤要能有所感，而能察內情、說關鍵，尤屬上乘。在日記求全不可能的情況下，要避免「摸象」之譏，使用者不能以偏概全，或以全視偏。也就是說要有豐富的歷史知識，才能裏外通貫、掌握全局。

近年來日記大量出版，自是研究近代史者的福音，不過，使用日記，仍得留意作者寫法、習慣與目的。為自己寫的日記多失之片面主觀，為別人而寫的日記往往事多隱晦，等而下之，造假的日記，固不可取，子女、夫人淪為日記殺手時，史家更只能徒呼負負。日記是史學研究的第一手史料，仍宜利用檔案及他人記載作比較、對証，以求歷史真相，免落入單一史料之弊。

